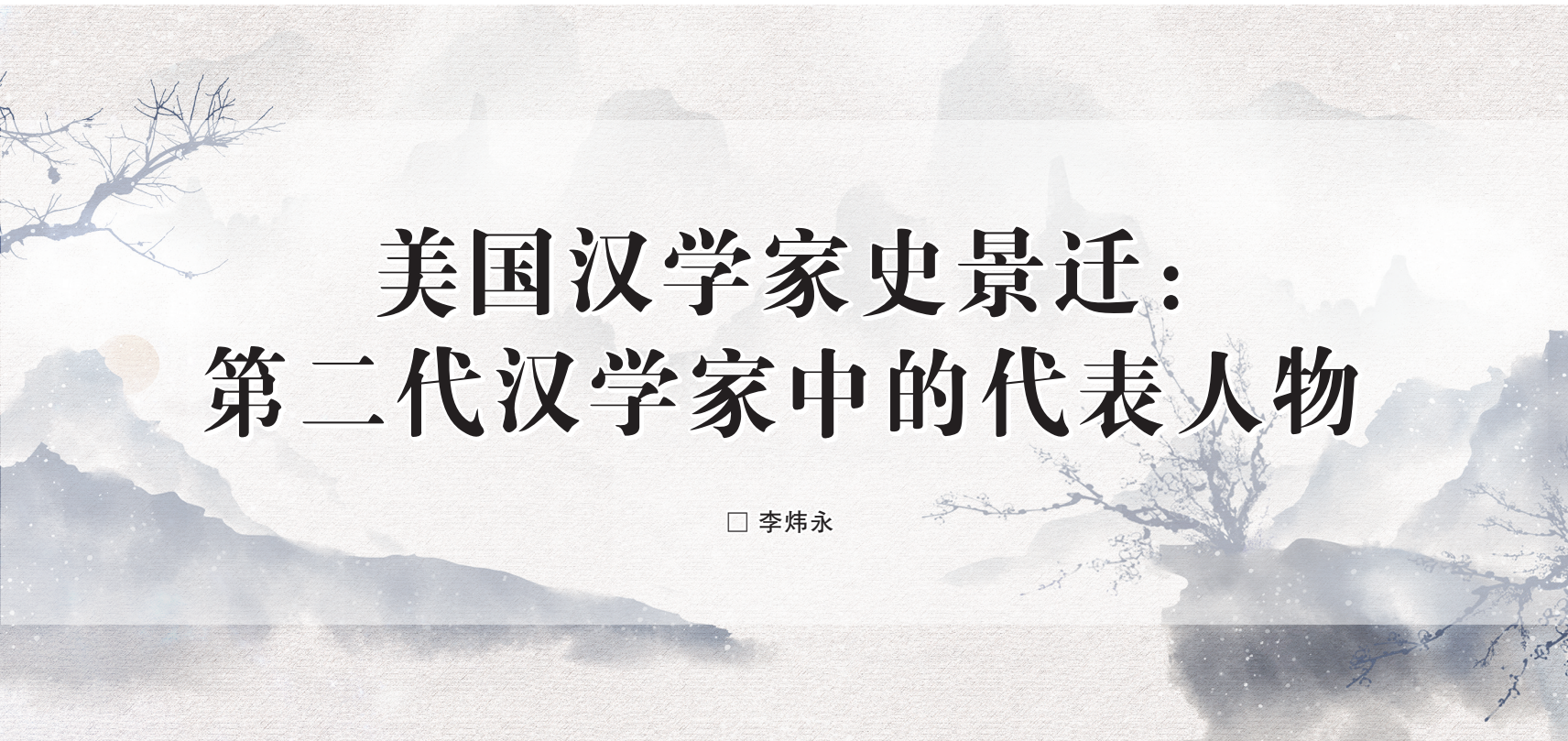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汉学家，以研究明清史见长，在西方汉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20世纪60年代初，还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时，史景迁的导师——明清史学家房兆楹给他起了这个中文名字，意为“学习历史、景仰司马迁”。因这一名字带有浓厚的“中国风”，也使中国读者与学者对他天然的有几分好感与亲近感。史景迁一生著述丰硕，研究领域宽广，集人物、社会、政治和跨文化交流研究于一体，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国历史纵横交错的方方面面。因在中国史研究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他被视为费正清之后第二代汉学家中的代表人物，与孔飞力、魏斐德一起并称为美国“汉学三杰”。

在耶鲁开启中国史的研究旅程

1936年8月11日，史景迁出生于英国伦敦，中学和大学先后就读于温彻斯特学院和剑桥大学，受到英国史学的严格训练。1959年因获麦伦奖学金，得到美国耶鲁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在耶鲁，史景迁遇到了对其学术生涯影响最为重要的两位导师：一位是芮玛丽教授，另一位就是房兆楹教授。芮玛丽是中国近代史与文献研究的权威专家，在她的悉心指导下，史景迁打下了良好的中国史研究基础。房兆楹则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华人学者。杨联升曾评价：“论明清史料史事，今日当推房兆楹、杜联袂夫妇。”正是在房兆楹潜移默化影响与指导帮助下，史景迁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这篇标题像历史小说的论文在中国史研究方面有着不俗成就，获得了地位相当高的珀特论文学奖，也使史景迁得以破例留校任教。

史景迁笔耕不辍，自博士论文出版以来，先后完成了10多部有关中国的学术著作，涵盖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他的每部著作几乎都受到了美国评论家的大力赞扬，屡屡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让带有专业色彩的历史书籍成为大众普遍喜爱的通俗读物并非易事，但史景迁做到了。与突出的学术成就相伴，史景迁在耶鲁一路升到“亚当斯历史讲座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并于2004—2005年间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01年被英国女王授予勋爵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第二代汉学家中的代表人物

□ 李炜永

爵位，还在2010年被授予“杰斐逊勋席”这一美国人文科学最高荣誉。

以文学式笔法讲述鲜活的中国故事

通读史景迁的著作，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当推其对历史叙事方式的创新。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史学的科学化成为现代西方史学的主导潮流。与此相伴，史学科学化带来历史叙述的艰深晦涩，但史景迁的作品与众不同，不仅文学性极强，而且极富感染力与可读性。他的学生郑培凯评论：“他最擅长的还是叙述，讲故事的本领”。在构思上，“从小的选题环节切入，一步步铺陈编织渲染，最终形成宏大的历史架构”。在他的心中，并不是预先有一些理论与宏大设计，而是总充满着“暗示、图像、场景与声音”等细节。细节是个体化的，能够灵敏地捕获抓取细节是史景迁的专长，一旦被某种细节所吸引，他便沉醉于这种“拼图游戏”之中，去构建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这些事物存在的整体历史环境。他文笔优美，状物写景功力精湛，用字非常精确，不像那些学时髦的，要一层一层堆叠，以致有人断言，只要熟读史景迁的若干著作，英文写作就能大体过关，因此有人称他为“当代史

学家中的语言文学大师”。

写人是贯穿史景迁历史研究的永恒主题。有评论认为：“如果说孔飞力的故事是通过事件来说明社会问题。那么，到了史景迁这里，人成为真正的主角。”“翻开他的书，马上会碰到人。他觉得人是最有意思的。”在史景迁笔下，既有封建帝王——《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也有传教士——《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还有普通百姓——王氏，在《王氏之死》中，这位山东郯城连姓名都弄不清楚的乡村妇女也成为他极力刻画描绘的主人公。他的立意并不是突出传主们有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绩，而只是平等地将他们视作历史长河中曾经生活过的一个人或一群人。有学者认为：“史景迁想告诉人们的，无非是这些人如何以自身的禀赋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去生活，去思考，去实现其生命的旅程和存在的价值。”所以，对人的探讨，实际上也就是对生活 and 生命意义的探讨。

为整合断裂的材料，或为烘托气氛增加作品的可读性，史景迁采用了“想象”这一手段来进一步还原历史，如王氏死前的梦，还有《胡若望的困惑之旅》中胡若望归家后与孩童的对话等，都是无可否认的纯粹想象与虚构。这也是史景迁作品最易引发争议的地方。有评论认为，其著作“小说

手法胜过历史的描述”，在“消弭历史与小说的界限上走的最远”，还有人认为他的作品不能划归为学术著作，这些作品都是在讲故事，而不是写历史。

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历史学研究，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以来一直有一种认知占据主导地位，即历史学家必须要以纯客观的态度对史料进行考订、辨伪、去伪存真，尽量避免主观色彩，只有这样，事实才得以确立。也就是说，“历史”与“小说”之间、史实与想象之间、客观材料与历史学家的主观态度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显然，史景迁的写作并不符合这一点。反而，在后现代主义史学那里，历史与文学的沟通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和强调。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像文学一样，需要想象，而不是完全从事实出发。由此，有人将史景迁的作品归入后现代主义的流派。对于这一结论，他的态度不置可否：“也许是，也许不是”。

事实上，自博士论文写作以来，史景迁就十分注重历史材料的考据。哈佛大学欧立德教授认为，“史景迁开创了西方人将原始中国文献作为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做法”。如《曹寅与康熙》就查阅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大量清代密疏；《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则采用了诏书、敕令、各种各样的谈话等各类材料；而对洪秀全与太

平天国的研究是建立在大英图书馆馆藏中国文献的基础之上，这些材料之前一直不为人知。在《王氏之死》中，史景迁利用了《郾城县志》这样的地方志材料，使该书成为方志入史的典范。史景迁对每一份档案、史料来源、准确性异常的严苛，以求忠实的还原历史，以至“即使抽掉所有这些想象的细节，也并不影响其对历史的主要学术观点”，而这与“取消了对事实与真实的追求”，可以天马行空对史事肆意虚构的后现代主义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当面对其著作是“小说”而非“历史”的指控时，史景迁坦承，“我写的不是‘历史小说’，即编造出来的故事。我只是‘将历史写得像小说’，务求以最活泼生动的方式来写历史而已。”换句话说，他运用历史想象，只是为了在历史学法度允许的范围内更好地描述事实。

史景迁不仅长于著书立说，还是一位出色的演讲家。他在耶鲁教书的时间很长，讲授的“追寻现代中国”历史课程闻名整个校园。如同他的写作一样，他的授课并不拼命地追求学术性和科学性，而是“企图在局部或有限范围内精确地描摹历史、还原历史，或发现历史中所隐藏的‘规律性’”。特别是讲演中加入了一些表演的色彩，诙谐的语气、生动的表情、

炽热的激情，大段诗歌、散文、小说等的引用背诵，极富画面感与活力，从而把毫无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学生带入特定的史境。

毕生奉献于传播中国文化

史景迁以等身的中国史著述、独特的叙事方式与人文主义情怀，享誉整个国际汉学界，其取得骄人成绩的背后源于对中国文化的痴迷与热爱。他将自己称为中国历史的“皈依者”。2018年在获得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时，他深情表达了这份热爱之情：“60多年前，我开始对中国着迷，从此再也无法说服自己去追求别的事业……”

2021年12月26日，史景迁辞世，国际汉学界从此失去了一位旗帜性的人物。各界纷纷发文悼念，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回顾史景迁的一生，他倾力所作的就是实现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他多次说到，中国是那么复杂而令人着迷。“我的兴趣在于引起人们对中国的兴趣。那里有些我们西方人闻所未闻、思所未思的事情。我们需要努力去了解”。而更需我们着意的，是他对“他性”的一种深刻理解：“我们需要让中国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故事，而不是总是告诉他们应该对我们讲些什么”，“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也就越近”。史景迁的著述始终呈现的正是这种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融汇与内在张力。

毫无疑问，史景迁的学术研究为改变汉学在美国的边缘地位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成功地向西方世界揭开了这个国度昔日的神秘面纱，以一种通俗易懂、易于理解的方式将其意义与内涵呈现在人们面前”。当1960年代史景迁将目光投向中国的时候，中国史研究在美国史学界还难以跻身主流。而60余年后，伴随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史研究在西方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今天，虽然史景迁作为个人的历史书写不能再延续，但是他关于中国的大量著作无疑将永恒成为外部世界理解这个文明古国的一把钥匙。



贺衡夫：一生为公的爱国实业家

□ 肖遥

贺衡夫（1888—1968年），名良铨，祖籍湖北黄冈，清朝初年祖上搬迁至汉阳蒲潭。他出生于普通农家，其父是武昌维新当铺的一位保管。少年时的贺衡夫家境贫困，迫于生计，16岁的他便进入汉口荣昌油行，成为一名学徒。三年后他返回家乡，凭借学到的经营本领，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商业之路，成为20世纪武汉家喻户晓的工商业巨子，被誉为“桐油大王”。

（一）

贺衡夫的发迹之路，是从贩卖油盐开始的。在贺衡夫生活的那个年代，投资桐油和淮盐生意，在湖北、湖南一带属于高回报行业。具有精明商业头脑的贺衡夫，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商机。先是经朋友介绍向沙市钱庄借贷2400串钱，购得淮盐50引，获得了第一桶金。后又兼营桐油，不断翻新品种，扩大经营规模，建立了对内外对皆营业的衡昌油行。就这样，贺衡夫以高效的管理，逐渐在武汉地区油盐行业中攀升至领先地位。到20世纪20年代末，贺衡夫在武汉商界中已经声名鹊起，成为当地最有名望的油盐商人。此时的贺衡夫，在多年的对外贸易中萌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他认为，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民族工业是能够振兴国家的重要力量。因此，他将在商业领域积累的资金，投入到民族企业，帮助纱厂、水电公司、银行等机构快速发展，并加盟了多个纺织公司，成为股东，向大实业家转变，同时积累起丰厚人脉，为日后参与各类商业活动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贺衡夫成为武汉工商业的翘楚后，他还参与了一些政治运动。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昌，国民政

府迁至武汉，武汉一时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地区，这时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也逐步迁至武汉，毛泽东、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在武汉向工人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罢工浪潮逐渐高涨，劳资矛盾逐渐突出。当时的贺衡夫，已经身兼汉口总商会董事、执行委员、油业工会理事长等职务，并深为汉口工人群众所熟知。于是，中国共产党联系到贺衡夫，希望他能够为工人发声，协助改善工人生活、保障工人权益。贺衡夫一口答应，紧接着对武汉地区劳资状况展开了大量调查研究，协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调解劳资纠纷。鉴于贺衡夫在这类事件中的良好表现，以及他在武汉地区的影响力，1931年9月，在汉口市商会的成立大会上，贺衡夫被推选为会长。在此之后，他便殚精竭虑地为武汉地区的工商界服务，维护行业利益、调节内部纠纷等。当武汉地区遭遇特大洪灾时，他也是第一时间站出来，领导商会储备物资、救济灾民、积极募捐、重建灾区。勤做善事，回报社会成为贺衡夫一生践行的原则。

（二）

1931年9月，柳条湖事件爆发，日军以武力侵占东北，开启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在短短三个月内，日军的铁蹄就践踏了东北三省，东北地区全部沦陷，有压迫就有反抗，这种侵略行径激发了全国人民强烈的反日情绪，武汉也不例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武汉工商界领导者的贺衡夫，也力赴国难，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中，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首先是配合调查，支援抗战。

据贺衡夫回忆，1932年1月，国际联盟派出代表组成调查团前往中国，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径展开调查，但在此过程中，日本帝国主义者歪曲真相，试图证明日军侵占中国是正义的行为。贺衡夫联合武汉工商界，与调查团展开座谈，痛斥日军的虚假宣传，并强调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是日本先挑起的战事，希望国际联盟能够从中起到调节的作用，阻止日军的侵略计划。后来，贺衡夫领导汉口商会，表示在国难之际，要做好后盾、全力支持抗日战争。紧接着，汉口市商会就全部切断了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并在淞沪会战期间，向全市工商业者发布通告，募集捐款，在很短时间筹到22万元用来支援上海；而且，贺衡夫还指导商会成立工作团，慰劳受伤民兵。

其次是决心内迁，不做汉奸。抗日战争期间，国共领导人前往武汉，在此筹备抗日活动。为了应对共同的敌人，挽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在武汉，贺衡夫等商会领导人对这一合作表示了热情支持，并与武汉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一同迎接了后备军。但由于抗战初期敌我力量悬殊，在中日武汉大会战中，武汉告急。此时贺衡夫考虑到，要最大程度地保存民族工商业，因此组织汉口市商会对武汉地区的民营企业进行搬迁。但在撤离前，贺衡夫还遇到一件棘手事情，一位名叫侯永德的人找到了贺衡夫，此人正是日本特务机构安插在武汉的眼线，他希望贺衡夫能够留在武汉，出面协助汉奸维持这一地区的商务，试图将他发展为为日本人效力的汉奸。但此举被贺衡夫识破，他坚定地拒绝了这一请求，来到了重庆。

最后是维持经营，稳住后方。在重庆期间，贺衡夫与友人一同开

设了纺织工厂。凭借多年积累的经营技术，贺衡夫所经营的纺织厂成为中南地区纺织行业中的巨头，在后方为军民提供了大量纺织品。在1940年，贺衡夫还与同时迁至重庆的汉口市商会中的成员一道，创办了庆华颜料厂，为国内市场提供了质量不逊色于进口的产品。多年的经营也使得贺衡夫在重庆积累了一些资金，他用赚到的钱来筹集灾款、救济灾民，力所能及地帮助困难民众渡过难关。同时，贺衡夫还参与了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的工作，调查在战争中损失的人力财力物力，为稳定抗战后方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抗战胜利后，贺衡夫与家人回到武汉，第一时间筹划恢复生产。1946年，贺衡夫高票当选为汉口市商会理事长，在他的引领和示范下，武汉地区工商业开始恢复。到1949年9月前，贺衡夫所推进的工作主要包括：着手整合武汉地区工商业同业公会、布置各钱庄尽快登记复业、接受大冶源华煤矿有限公司并试图进行复工、参与增资改组汉口商业银行、协助筹建武汉大桥、向国民政府致电请求准予将汉口恢复为直辖市、指导汉口工业协会的成立、用个人财产为武昌第一纱厂担保等。在解放战争即将迎来胜利前夕，贺衡夫还同中共派到武汉的地下组织建立联系，通过商会与国民党展开斗争。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取得胜利后，贺衡夫召集武汉工商界代表开会，成立了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这一团体除防止国民党破坏城市，还筹备了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工作，为武汉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在武汉和平解放前，贺衡夫因受到国民党反动派胁迫，和家人离开了汉口远赴香港。但贺衡夫密切关注着内地动态，时刻惦念家乡。新中国成立后，他与家人回到武汉，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情接待。1950年，贺衡夫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同时任中南财经委员会委员。之后，贺衡夫出任武汉市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等职务。在此期间，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人民群众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怀着对社会主义的渴望，贺衡夫响应党中央对工商业采取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号召，全身心投入到各类事务中，推动武汉工商业的发展。他全力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带头购买国债、捐献经费、帮扶灾区。同时，贺衡夫还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朝鲜战争期间，他动员家人参军，将自己的孙子送去军校支援前线，代表武汉工商界向朝鲜难民捐赠慰劳金，带领市工商联筹委会捐出战斗机。一时间，贺家人踊跃参军的事迹传遍整个武汉。1968年1月，贺衡夫因病逝世，1981年9月，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肯定他是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

贺衡夫作为一位无私的爱国实业家，一生积极回馈社会、报效国家，为方方正正朴、守信重义、济困扶危、慷慨好施，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